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再分配对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社会认知视角

侯玉波　葛枭语

(北京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暨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摘　要: 许多研究发现了收入不平等对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消极影响,但也有研究发现这种影响根本就不存在,甚至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了产生这种矛盾结果的原因,并提出以社会认知为解释机制的理论框架——客观的收入不平等通过个体对分配过程和结果公平的感知形成主观认知,继而通过个体、人际与社会三层机制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文章还分析了作为政府减少收入不平等手段的收入再分配对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影响。这些分析对理解和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收入不平等;收入再分配;主观幸福感;基尼系数;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B 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1-0150-11

一、引　言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费希尔(Irving Fisher)所说的那样,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为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努力地谋求经济增长,从而能让人民幸福。但实际研究却发现,经济增长未必能带来幸福,伊斯特林提出的幸福-收入悖论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伊斯特林指出,从横断研究来看收入和幸福之间存在正相关,但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二者并不关联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居民幸福感并不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一悖论在我国也同样存在——从 1990 到 2012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达到了 10%,但国民幸福感的均值在 1990、1995、2001、2007、2012 年分别为 7.29、6.83、6.53、6.76、6.86②,并未伴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没能带来更高的幸福感?诸多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世界银行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20 左右,而 2006 年跃升至 0.496③;201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2008 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491,2015 年回落至 0.462④;而 Xie 和 Zhou 则认为,2005 至 2012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处在 0.53-0.55 的高位⑤;2015 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指出,收入最高 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 20%家庭的 19 倍。同时,还存在灰色收入与垄断行业

收稿日期:2019-08-12

作者简介:侯玉波,陕西凤翔人,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判性思维的中国人创新观念与行为的影响”(项目编号:31671159)

① 晏小华、刘振亮、王祥坤、沐守宽:《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心理科学进展》2018 年第 1 期,第 180—189 页。

② 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2016 年第 8 期,第 34—50 页。

③ 冯贺霞、韦轲:《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16 年第 22 期,第 113—117 页。

④ 张若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经济因素分析》,《决策与信息》2017 年第 10 期,第 58—72 页。

⑤ Xie, Y. and Zhou, X.,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4, 111(19): 6928-6933.

收入过高、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覆盖面有限、碎片化或双轨制问题,这些因素使收入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财富逆向转移的问题①。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生活的不良影响很大,比如它与更糟的生理健康状况有关②,能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受伤、综合生理症状以及对正常活动产生限制的生理状况等③。在美国,基尼系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每十万人中的死亡人数增加 12.9 例④。因此,尽管一个社会总体经济变好,但假如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居民非但感受不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反而因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而出现种种心理与生理隐患。所以,研究收入不平等及其负性影响对我国而言是认识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抓手。

作为政府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手段,收入再分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税收和福利政策是收入再分配的主要表现形式⑤,提高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的比率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本文将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收入再分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加以展望。

二、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感受和评估,许多国家将它作为一种政策指标⑥。在心理学的范畴中,它包含生活满意感和情绪体验两个方面,而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有时也仅使用生活满意感来作为它的量化指标。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对二者关系的判断都是负性的,如表 1 所示,即收入不平等损害了主观幸福感。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都采用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发现它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即基尼系数的增加能显著预测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降低。研究者还发现基尼系数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性效应远大于经济增长的正性效应⑦,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侵蚀了经济增长给居民带来的幸福感。不仅针对省份间差异进行分析的研究支持这种关系,针对年份间差异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例如研究者发现德国人在不平等水平低的年份里感到更幸福⑧,Cheung 发现随时间变动的净基尼系数每增加 10%,对生活满意感的损失作用相当于家庭年度收入降低了 2102 欧元,或者相当于人均 GDP 降低了 2414 美元⑨。

---

① 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2016 年第 8 期,第 34—50 页。

② Kawachi, I. and Kennedy, B. P.,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999, 34(1): 215-227.

③ Quon, E. C. and Mcgrath, J. J., "Province-Level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Outcomes in Canad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2015, 40(2): 1-11.

④ Kawachi, I. and Kennedy, B. P., "The Relationship of Income Inequality to Mortality: Does the Choice of Indicator Matter?",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7, 45(7): 1121-1127.

⑤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⑥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⑦ 冯贺霞、韦轲:《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16 年第 22 期,第 113—117 页。

⑧ Roth, B., Hahn, E., and Spinath, F. M., "Income Inequality, Life Satisfaction, and Economic Wor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2017, 8(2): 133-141.

⑨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表 1　支持收入不平等降低主观幸福感的典型研究

样本年份	样本地区	样本量	预测源变量	被解释变量	主要结论	研究者	时间
1972—2008 年	美国	48318	基尼系数	主观幸福感(3)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 0.385	Oishi 等	2011
1975—1992 年	欧洲 12 国	103773	基尼系数	生活满意感	IV 每增一标准差,被分在幸福组的人数比例减少 0.025	Alesina 等	2001
1981—2004 年	全球 84 国	267870	基尼系数	生活满意感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 0.029-0.047	Verme	2011
1984—2012 年	德国	57533	基尼系数	生活满意感(11)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 0.047	Roth 等	2017
1984—2013 年	德国	57932	净基尼系数	生活满意感(11)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 0.45	Cheung	2018
1989—1996 年	美国	7023	收入分布的偏度	整体幸福感(3)	IV 每减一单位,DV 下降 0.053	Hagerty	2000
1989—2012 年	全球 33 国	112876	净基尼系数	生活满意感(10)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 0.064	Cheung	2018
1990—2007 年	中国	5515	基尼系数	主观幸福感	IV 每增一标准差,报告“很幸福”个体的比例降低 0.030	鲁元平等	2011
1990—2014 年	经合组织 21 国	208	净基尼系数	生活满意感(11)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 0.05-0.06	Graafland 等	2017
2002—2008 年	欧洲 29 国	179273	基尼系数	生活满意感(11)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 0.051	Hajdu 等	2014
2005 年	中国	10372	基尼系数	幸福感	Logistic 回归的系数为-1.470,显著	黄嘉文	2016
2005—2008 年	中国	24424	基尼系数	主观幸福感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的概率增加 26.6%	冯贺霞等	2016
2006 年	德国	3059	感知的收入不平等	生活满意感(7)	IV 每增一单位,DV 下降 0.06	Schneider	2012
2006—2010 年	中国	27888	收入不公平感	主观幸福感	IV 每增一单位,DV 平均下降 8.4%	阳义南等	2016
2010 年	中国	7044	感知的收入不平等	主观幸福感	IV 与 DV 的回归系数,使用 Ordered Probit 为-0.241,使用 OLS 为-0.175,均显著	陈池波等	2016
2011 年	日本	10432	感知的收入不平等	感知的不幸福	分层 Logit 模型中 OR=2.12,显著	Oshio 等	2014
2011—2012 年	美国	456719	大区域的基尼系数	BPL(11)	都市统计区域 IV 每增一单位,DV 降 1.079;州水平 IV 每增一单位,DV 降 1.099	Ifcher 等	2016
2012 年	中国	19583	前 10%收入与后 10%收入之比	生活满意感	Ordered Probit 模型中 IV 存在负的、接近于零的、显著性很强的系数	Lei 等	2017

注:“被解释变量”一列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几点量表,例如括号内数字为“3”则为三点量表。“主要结论”一列中“IV”指预测源变量,“DV”指被解释变量。

有研究者用幸福感标准模型来整合跨国和纵向追踪数据,结果也相当稳定①。但这种负性影响在不同人群中表现不同: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相比,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主观幸福感负面影响更大②。收入不平等不仅存在即时影响,还存在迟滞影响。研究者考察了 40 个国家 1979—2014 年的基尼系数与 1994—2014 年 11-14 岁个体身心失调症状及生活满意感之间的关联发现,女性 0-4 岁时所处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可以预测其 11-14 岁时的身心失调症状和低生活满意感;0-10 岁时社会的平均基尼系数与其 11-14 岁时低生活满意感有关③。除基尼系数,有研究者采用其他指标来量化收入不平等,比如收入分布的偏度④、收入前 10%居民的收入与收入后 10%居民的收入之比⑤等。偏度越低说明更多的收入集中在收入较高的群体中。对 1989-1996 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社区内收入分布的上限越高、偏度越低,居民幸福感越低⑥。

然而在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研究者对全球 85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与居住在平等国家的人相比,居住在不平等国家的人报告了更高的幸福感⑦。对中国样本的分析也有类似的发现,例如对 2002 年全国家庭调查中约 9200 个农村家庭的数据分析发现,县级水平的基尼系数对生活满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在控制了一系列哑变量后,预测作用不再显著⑧。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没有关联,有研究者通过对 24 个研究做元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和主观幸福感的整体相关性在统计上不显著⑨。还有研究者甚至指出,社会不平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是误导性的结论,在控制了国家人均 GDP 后,2003 年欧洲国家水平的基尼系数对生活质量没有显著效应,收入不平等并未减少幸福感、生活质量和主观健康评价⑩。此外,也有研究者发现了混合的结果,例如对 2005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 32 个经济体数据的分析发现,工业化经济体中的基尼系数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新兴经济体中则可以正向预测⑪。在收入不平等与幸福关系问题上,为什么会有矛盾的结论呢?

---

① Verme, P., "Life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2011, 57(1): 111-127.

② 鲁元平、王韬:《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1 年第 4 期,第 1437-1458 页。

③ Elgar, F. J., Gariépy, G., Torsheim, T., and Currie, C., "Early-life Income Inequality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7, 174: 197-208.

④ Hagerty, M. R., "Social Comparisons of Income in One's Community: Evidence from National Surveys of Income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4): 764-771.

⑤ Lei, X., Shen, Y., Smith, J. P., and Zhou, G.,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and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7.

⑥ Hagerty, M. R., "Social Comparisons of Income in One's Community: Evidence from National Surveys of Income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4): 764-771.

⑦ Rözer, J. and Kraaykamp, G.,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ross-National Study on the Conditional Effects of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3(3): 1009-1023.

⑧ Knight, J., Song, L., and Gunatilaka, 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4): 635-649.

⑨ Ngamaba, K. H., Panagioti, M., and Armitage, C. J.,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17.

⑩ Zagorski, K., Evans, M. D. R., Kelley, J., and Piotrowska, K., "Does Nat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Individuals' Quality of Life in Europe? Inequality, Happiness, Finances, and Healt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4, 117(2): 1089-1110.

⑪ Edsel, L. and Beja, J., "Subjective Well-Being Analysis of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or the Industrializ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4, 9(2): 139-156.

首先,可能是因为研究者混淆了时序效应(Time-Varying Effect)和区际效应(Between-Region Effect)。研究者发现当收入不平等随时间变化时,收入不平等的升高会带来生活满意感的降低;然而与不平等程度较低地区居民相比,生活在不平等程度较高地区的居民倾向于报告更高的生活满意感①。研究者推测,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居民对不平等有不同的预期和容忍度,用客观指标进行直接对比无法反映出居民心理主观感受的真实差异。Schröder 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当一个国家不平等比以前更高时人们感到更不满意,而非当自己国家不平等比其他国家更高时感到更不满意②。

其次,可能是因为收入不平等作为衡量社会不平等指标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有研究者指出,与发达国家不同,支出在发展中国家比收入更有效③。对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使用收入不平等预测生活满意感不如支出不平等有效。使用收入基尼系数预测生活满意感不显著,而使用收入前 10%居民的收入与收入后 10%居民的收入之比预测生活满意感,系数接近零;而使用支出不平等进行预测时,无论是支出基尼系数,还是支出前 10%居民的支出与支出后 10%居民的支出之比,都能显著地负向预测生活满意感,且系数比用收入进行预测时大得多。

最后,可能是因为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是倒 U 形曲线。研究者对 1972-2010 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和 2002-2006 年欧洲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支持了倒 U 形曲线关系的假设,美国样本的拐点是 0.356,欧洲 2002、2004、2006 年样本的拐点分别是 0.301、0.306 和 0.286④。对中国样本的分析也有类似的发现,对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就发现区县、乡镇/街道和社区的拐点分别为 0.40、0.36、0.35⑤。也就是说,当基尼系数低于拐点时,幸福感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大而增强;而当基尼系数超过拐点时,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的负性关系才得以表现。为什么存在这种现象?研究者进一步推测,当收入不平等相对低时,起主要作用的是信号效应,居民把收入不平等视作社会流动性的信号,认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更幸福;当收入不平等超过临界点后,起主要作用的就变成了嫉妒效应,这时由于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居民对向上流动的预期破灭了,嫉妒富人,从而更不幸福⑥。信号效应仅在 2002-2006 年欧洲样本中得以体现,嫉妒效应则在这一样本和 1972-2010 年美国样本中体现出来。

三、从社会认知视角理解二者的关系

在心理学看来,客观的社会环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客观环境的主观感受和解释才是真正影响人类心理的因素,客观环境只有通过社会认知的解读才会对心理产生影响。按照这一观点,收入不平等的客观特征对人心理产生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在主观上是如何感知和解读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者

①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② Schröder, M., "Income Inequ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Unrelated Between Countries, Associated Within Countries Over Tim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7.

③ Lei, X., Shen, Y., Smith, J. P., and Zhou, G.,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and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7.

④ Yu, Z. and Wang, F.,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 1-6.

⑤ 孙计领:《收入不平等、分配公平感与幸福》,《经济学家》2016 年第 1 期,第 42-49 页。

⑥ Yu, Z. and Wang, F.,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 1-6.

发现,个体的收入不公平感①和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②显著降低了幸福感,当人们主观上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时幸福感就会降低。

Schneider(2012)强调了社会认知在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建立了收入不平等的社会认知模型(图 1)③,认为社会地位特征影响了个体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对收入不平等的偏好、对社会流动性的感知,由此影响了生活满意感。模型中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是指个体所认为的大型组织主席或总经理平均月收入与无技能工人平均月收入的比值,对收入不平等的偏好是指个体所认为在公正情形下大型组织主席或总经理应得月收入与无技能工人应得月收入的比值,对社会流动性的感知是指个体认为自身所处社会中自我发展的机会均等、努力能够得到回报、能够因为智力和技能获得报酬的程度。这三个因素中前两个是对社会分配结果公平的感知,如果个体认为社会就应当维持较大的收入差异(偏好较高)或其主观上就认为现有分配制度是平等的(感知较低),那么无论客观收入差距有多大,其主观幸福感都不会受到损害。这时如果直接用客观收入不平等去预测主观幸福感,效果无疑会打折扣。而第三个因素是对社会分配过程公平的感知。Schneider 使用 2006 年国际社会公正状况调查(ISJP)中德国数据对这个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能显著地负向预测生活满意感,对收入不平等的偏好和对社会流动性的感知则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生活满意感。这三个因素在家庭收入对生活满意感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收入不平等究竟是通过什么因素作用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我们认为有三种:

一是个体机制:包括个体的公平感、信任感和希望感。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会直接影响个体心理感受,而这些心理感受是评估自己生活质量和前景的重要参考。首先,收入不平等会影响个体的公平感,其中分配公平感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Oishi 等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幸福的负性影响是由个体感知到的公平感和一般信任感来解释的④,与收入更平等的年份相比,美国人在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年份里更少地信任他人,从他人身上感知到的公平感也更少。其次,收入不平等会影响个体的信任感。研究发现关系信任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⑤,人们对他人越信任,自己就越感到幸福,并且关系信任在收入不平等和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Rözer 等在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的正性关系后指出,这种关系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当个体体验了更多的社会和制度信任感,或所处国家的社会和制度信任感水平较高时,这种正性关系就变得更弱⑥。此外,收入不平等还会影响个体希望感。Cheung 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与生活满意感存在正向关系,而在中国城市地区则没有。希望感是解释这种正向关系的因素⑦,因为农村地区的人们认为收入不平等

---

① 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2016 年第 8 期,第 34—50 页。

② Oshio, T. and Urakawa, K.,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a Social Survey in Japa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4, 116(3): 755-770;陈池波、李成豪:《收入不平等、再分配偏好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财政研究》2016 年第 12 期,第 66-79 页。

③ Schneider, S. M.,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Life Satisfaction: What Role do Social Cognitions Pla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2, 106(3): 419-438.

④ Oishi, S., Kesebir, S., and Diener, E.,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9): 1095-1100.

⑤ 黄嘉文:《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社会》2016 年第 2 期,第 123—145 页。

⑥ Rözer, J. and Kraaykamp, G.,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ross-National Study on the Conditional Effects of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3(3): 1009-1023.

⑦ Cheung, F., "Can Income Inequality be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Outcomes?: Hope Mediates the Positive Inequality-Happiness Link in Rural China",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2015, 7(4): 320-330.

包含了社会流动性的暗示,这种解释方法与 Yu 等在倒 U 形曲线的上升段所提出的信号效应①相似。与希望感相反,Roth 等则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的负性关系受经济担忧的中介,这种中介作用只在中产阶级身上存在,在穷人身上没有发现②。可以发现,同样是面对收入不平等,如果个体从中感受到了希望,其幸福感就会上升,如果个体从中感受到了担忧,其幸福感就会下降。而个体究竟是选择希望还是担忧,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或许与个体的经济背景、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有密切联系,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对内在机制的考察是将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关系研究推向深入的重要抓手。

二是人际机制:包括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收入不平等不仅通过个体内在机制产生影响,还会在人与人的交互中发挥作用。就社会比较而言,对来自美国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 2005—2010 年数据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以后,高的地区收入与低的生活满意感有关,更高的收入不平等会使这种效应增强,尤其是对于低收入者③。Lei 等用真实收入地位与所感知到的收入地位的比值来量化攀比,攀比值越高意味着个体所感觉到的自己收入的相对社会地位更差。结果发现支出不平等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攀比值,生活支出不平等越高的地方攀比值越高④。就相对剥夺感而言,有研究者将相对剥夺感分为横向剥夺和纵向剥夺,无论个体在经济地位的哪种比较中处于劣势,都会形成相对剥夺感,并因此降低幸福感⑤。促使相对剥夺感产生和加剧的因素很多,并不单是收入不平等的特征,如果感知到身边存在非法牟利等不公平现象,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会被进一步放大。因此,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的关系能否得以建立,有时还需要通过社会比较及其所诱发的相对剥夺感来达成。如果身处一个法制健全、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社会,一定程度内的收入不平等常被认知为自由竞争的结果,不会损害幸福,反而促使人们按照规则积极参与公平竞争,以获得更高收入。

三是社会机制:指社会大环境产生影响。例如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更多暴力犯罪⑥,Schneider 指出,平等使得个体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社会因此更加和谐。而不平等则可能导致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例如频繁的犯罪和暴力、尖锐的工业纠纷和政治冲突,而这些都将降低人们生活满意感⑦。对 1990-2007 年中国数据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发现收入不平等通过犯罪间接地对居民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⑧。不仅如此,收入不平等还会带来社会服务投资不足、社会凝聚力瓦解、社会资本侵蚀、恶性社会比较等问题,从而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⑨。收入不平等摧毁了和谐有利的社会大环境,限制了个体的

---

① Yu, Z. and Wang, F.,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 1-6.

② Roth, B., Hahn, E., and Spinath, F. M., "Income Inequality, Life Satisfaction, and Economic Wor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2017, 8(2): 133-141.

③ Cheung, F. and Lucas, R. E., "Income Inequ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Social Comparison Effects: The Effect of Relative Income on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6, 110(2): 332-341.

④ Lei, X., Shen, Y., Smith, J. P., and Zhou, G.,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and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7.

⑤ 黄嘉文:《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社会》2016 年第 2 期,第 123—145 页。

⑥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⑦ Schneider, S. M.,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rends,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6, 17(4): 1719-1739.

⑧ 鲁元平、王韬:《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1 年第 4 期,第 1437—1458 页。

⑨ Kawachi, I. and Kennedy, B. P.,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999, 34(1): 215-227.

发展,并最终损害了个体的幸福。

综上所述,收入不平等通过三个方面的内在机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据此,我们提出了如图 1 所示的内在机制框架图:图的前半部分参考了 Schneider 的社会认知模型,后半部分则是综合相关文献所做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当个体面对客观的收入不平等时,首先通过对分配过程和结果公平的感知来形成社会认知,在主观上得出一个关于收入分配是否平等的结论;当个体在心理上形成了这种认知后,其公平感、信任感、希望感会受此影响,通过与他人的社会比较又形成相对剥夺感。而社会大环境同样对个体形成效应,这些机制协同作用,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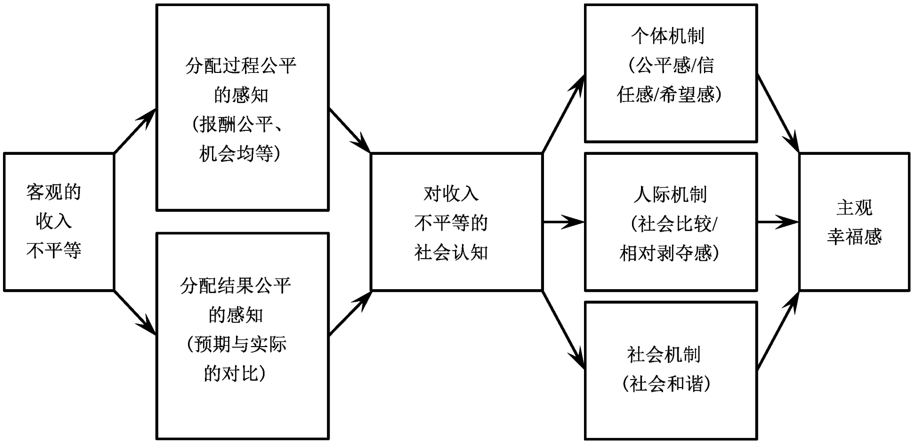

图 1　收入不平等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

四、收入再分配与主观幸福感

收入再分配政策是由政府主导的削减收入不平等的手段,它对主观幸福感有怎样的影响呢? 这类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采用收入再分配的过程来量化收入再分配的程度。税收和福利政策是政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对 2006—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①;还有研究者发现政府的医疗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能正向预测居民幸福感②。这里出现了一个疑问,是否只要有再分配就有利于提升幸福感呢? 事实上再分配同样存在着分配公平性的问题。阳义南等指出,社会保险不公平会加剧收入不公平感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对没有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的人来说,收入不公平感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比那些有保险的人更大。尽管目前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不同人群的待遇差异较大,存在着分配不公平的隐患。一旦人们在心理上形成了这样的认知,那么收入再分配反而变成了二次伤害。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收入再分配的结果来量化收入再分配的程度,用基尼系数的削减程度来代表收入再分配的力度。Hajdu 等提出了削减不平等程度的公式,即总基尼系数与净基尼系数之差除以净基尼系数乘以 100,对 2002—2008 年 29 个欧洲国家数据加以分析,发现削减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能显著预测生活满意感的增加,削减不平等程度每增一单位,生活满意感(11 点量表)上升 0.036③。Cheung 采用了类似的计算方法,使用市场基尼系数与净基尼系数之差除以净基尼系数来代表收入再分配的程度,

---

① 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2016 年第 8 期,第 34—50 页。

② 冯贺霞、韦轲:《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16 年第 22 期,第 113—117 页。

③ Hajdu, T. and Hajdu, G., "Reduc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urope", *Economics*, 2014, 8(35): 1-29.

发现随时间变动的收入再分配对生活满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再分配政策每削减 10%的基尼系数对生活满意感的提升作用,相当于家庭年度收入提高了 12715 欧元(在 1984—2013 年德国数据中),或者相当于人均 GDP 提高了 2524 美元(在 1981—2014 年 33 个国家数据中)①。以上研究表明,不论采用什么方法来量化收入再分配,结果都支持了收入再分配对幸福感的正性作用。

政府推行收入再分配政策能有效地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这种提升作用究竟是否对所有人有效呢?针对这个问题,Cheung 提出了绝对和相对收入假设②。绝对收入假设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从富人手中拿走一部分钱对其造成的幸福感损失,和把同等数额的钱送给穷人对其造成的幸福感增益是不同的,前者的绝对值要远小于后者。因此虽然从整个社会来看幸福感确实是得到提升,但是富人的幸福感事实上减少了,只是程度上不如穷人所增加的幸福感。相对收入假设则认为,真正损害幸福感的是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恶性社会比较、社会不信任和社会冲突。因此,收入再分配有助于构建和谐、互信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富人和穷人的幸福感都有提升作用。Cheung 对德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家庭年度收入和个人的税量并不调节收入再分配对生活满意感的影响。而对全球 33 个国家数据的分析也发现,收入再分配与生活满意感的正性关系在高收入与低收入个体中均存在③。可见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够使富人和穷人的幸福感都得到有效提升,获益者并不只是穷人,而是所有人。

虽然收入再分配对幸福感的正性影响有着良好的稳健性,存在于各类人群中,但其对不同特征的个体还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影响。收入再分配在高经济增长国家中对幸福感的正性影响比在低经济增长国家中更弱④。我国研究者发现,医疗支出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而对其他地区居民则没有影响;教育支出能显著提升中部地区、农村地区居民幸福感,却显著预测了东部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下降⑤。这些结果提示我们,收入再分配政策很可能对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有更强的正性效果。从个体特征来看,收入再分配对高收入者幸福感的正性影响比低收入者更弱,对高平等价值观个体幸福感的正性影响比低平等主义者弱⑥。对欧洲 29 国数据的分析发现,穷人更易受到削减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在政治倾向中偏于左翼的个体更易受到削减不平等程度的影响⑦。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再分配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不同影响,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从再分配中获益。

五、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程度和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程度的重要指标,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认知和解决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随

---

①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②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③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④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⑤ 冯贺霞、韦轲:《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16 年第 22 期,第 113—117 页。

⑥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⑦ Hajdu, T. and Hajdu, G., "Reduc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urope", *Economics*, 2014, 8(35): 1-29.

着数据采集手段和统计分析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大规模的研究得以展开,并在研究框架上不断细化深入,取得了许多新进展。收入不平等、收入再分配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首先,考察文化因素在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文化因素在其中的角色。例如不平等与幸福感的负性关系在欧洲样本中所达到的统计学显著性要高于美国;欧洲的穷人和政治立场偏左的人面对不平等感到更不幸福,在美国则没有关联。与美国左翼相比,欧洲左翼的幸福感更易受不平等的损害①。还有研究者发现,与经济不平等较低的情况相比,当感知到较高经济不平等时,个体将表现出更多的独立型和更少的互倚型自我构念②;与权力距离较低的文化相比,收入再分配对处于较高权力距离文化的个体的幸福感有更强的正性效应③。我国和西方在这一问题上或许存在一些差异: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公正平等的传统观念。例如《论语·季氏》中“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荀子·不苟》中“公生明,偏生暗”。又如《贞观政要》中所载“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在这样的传统下,民众对社会平等与公正有很高的期待。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文化氛围带有很强的社会主义特色,这是否使得影响有所不同,需要进一步考察。研究者对 2002—2008 年欧洲 29 国数据的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在东欧国家的影响力非常强,而在西欧国家却并非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综合以往的研究后认为,削减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后共产主义国家中不尽相同④。传统文化与当前社会制度促使我国民众形成了崇尚平等的心理,平等和公正也被写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这些都会潜在地降低社会认知模型中对收入不平等的偏好。

其次,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当前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呈现出混杂的结果,是由于量化方法与测量水平的界定存在模糊,所以未来需要更为统一的界定方法。Cheung 指出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可能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基尼系数,即再分配前和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后者又被称为净基尼系数,它反映的是个体经过税收和福利调节后实际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更能体现真实的经济情况⑤。对 1990-2014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1 个国家数据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净基尼系数对生活满意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总基尼系数则不显著⑥。以往有许多研究者并未严格区分所使用的基尼系数类型,这无疑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而在测量水平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大区水平和小区水平上的不同效应。例如对 2011—2012 年美国 Gallup 健康幸福调查数据的分析就发现,当以都市统计区域(MAS)和州的水平进行分析时,基尼系数可以负向预测可能的最好生活指数(BPL)、幸福感、自评健康程度等,正向预测压力感、担忧感、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等,而当以小区域水平进行分析

---

① Alesina, A., Tella, R. D., and Macculloch, R.,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 88(9): 2009-2042.

② Súnchez-Rodríguez, Á., Willis, G. B., and Rodríguez-Bailón, R., “Economic and Social Distance: Perceived Income Inequality Negatively Predicts an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7, (6): 1-9.

③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④ Hajdu, T. and Hajdu, G., “Reduc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urope”, *Economics*, 2014, 8(35): 1-29.

⑤ Cheung, F.,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67-882.

⑥ Graafland, J. and Lous, B., “Economic Freedom, Income Inequ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OECD Countrie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7.

时,基尼系数正向预测 BPL,但不能预测幸福感①。可见,测量水平的选择对于研究结论存在着影响。

第三,与简单描述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关系相比,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未来可以考察更多的内在机制,引入更多的中介变量。收入不平等是许多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短期内很难迅速改善。通过了解其个体的、人际的、社会的内在机制,我们可以获得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其他办法。研究者已经发现了许多潜在的中介变量。例如有研究者使用 Google Correlate 找出了与收入不平等有关的词条,发现在收入不平等大的州,使用相对频繁的 40 个搜索词中,70%可以被归为与地位有关的物品,而在收入不平等小的州是 0%②。这些受影响的因素是否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是未来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最后,可以更细致地研究收入再分配的效应。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相比,收入再分配的研究显得更为稀少,而后者对于政府制定政策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心理影响有着更为直接的实践价值。习主席把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照顾好弱势人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看成是政府工作的核心。通过对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细致研究,这类政策的制定可以有更多科学参考,例如考察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手段是否存在不同影响,收入再分配对不同群体是否发挥着不同作用等。弄清楚这些问题,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能够为社会平衡发展、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更多切实的建议。

The Effects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on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on

Hou Yubo, Ge Xiaoyu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Many researches demonstrat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eople's subjective sense of happiness, while others demonstrated opposite results or no relationship. After review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answer why results are contradictory, explai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on, and illustrate it via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mechanism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problem is proposed that objective income inequality forms individual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inequality by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distributive outcomes and procedures, and then influences subjective sense of happiness via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mechanism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reviews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effect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as governmental effort toward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on people's subjective sense of happiness, and find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was widely demonstrated. The findings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equality in current China.

Key words: income inequality, income redistribution, subjective sense of happiness, Gini coefficient, social cogni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Ifcher, J., Zarghamee, H., and Graham, C., "Income Inequality and Well-Being in the U.S.: Evidence of Geographic-Scale- and Measure-Dependence", *IZA Discussion Papers*, 2016.

② Walasek, L. and Brown, G. D. A., "Income Inequality and Status Seeking: Searching for Positional Goods in Unequal U.S. Stat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26(4): 527-533.